

《简·爱》空间策略分析

周小娟

(南京大学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3)

摘要: 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以主人公简·爱的女性主体反抗男性权威的女性个人叙述声音而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 文本以简·爱的个人叙事建构了中心化的女性话语空间, 但与之相对的是简·爱边缘化的日常生活空间, 使文本展示出逆向延伸的空间特征, 结合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福柯的话语理论探讨这一空间特征, 这是夏洛蒂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空间问题的思考, 同时为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阐释空间。

关键词: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 空间策略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204(2011)06-0093-04

A Criticism to JANE EYRE's Space Strategy

Zhou Xiaoju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Abstract: Charlotte Bronte's novel JANE EYRE has occupied a position of privilege in the feminist canon since it has a special female voice. The work forms a central female discourse space by JANE EYRE's individual narrative, but contrary to the female discourse space, there is a marginal Everyday life space. The work's space character is retrorse extending. The paper tries to analyze the novel's space character by means of Henri Lefebvre's Critique of Everyday Life and Michel Foucault's discourse theory. The work is Charlotte Bronte's considering about female space in Victorian age, meanwhile, this space character provides an analysis space for pursuers.

Key words: Charlotte Bronte; JANE EYRE; space strategy

19世纪英国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的小说《简·爱》(1847年)以第一人称的叙述手法,讲述了女主人公简·爱从贫穷的孤女成长为具有独立意识女性的故事,由于文本发出了女性主体反抗男性权威的声音而成为女性主义批评的经典文本,科拉·卡普兰将其读作“革命性主体宣言”,玛丽·普维及玛格丽特·霍曼斯等认为简的价值在于具有“讲述自己故事的能力”,苏珊·S·兰瑟评价小说“戏剧性地拓展了小说中女性个人叙述声音的空间”。空间问题是女性主义研究关注的问题,“不论在字面上还是在象征上,空间意味着被社会文化力量限制和确定,”而这最终加强了对“‘包含’和‘排除’的有关实践”。^[1]有评论者认为夏洛蒂小说的女性问题在于:她在哪里回答她是什么?^[2]

一、日常生活空间的边缘化

在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列斐伏尔的描述中,日常生活是一种重复性的、数量化的日常物质生活过程,其潜在地具有改变自身的可能性,他认为社会的本质依存于人的日常生活小事,人也是在日常生活小事中被真正塑造和实现出来的。日常生活中的人,能最直接地认识自身的处境。简的日常生活贯穿于5个地理空间:盖茨海德府、劳渥德学校、桑菲尔德府、沼屋和芬丁庄园,从日常生活中可以解读出简的边缘化空间:

在盖茨海德,里德夫人和儿女们在休憩室里“看上去很是快活”^{[3]1}。而简独坐在早餐室的窗台上阅读《英国禽鸟史》:“我爬上窗口,缩起脚,……仿佛坐在神龛里似的。”^{[3]2}尽管在周围人眼中,简在

里德家的地位只不过是一个“碍手碍脚的外来人”^{[3]10}。但她在窗台上的隐秘空间中感到愉快。

在劳渥德学校,简刚刚树立信心争取做一个好学生,布洛克赫斯特却当众宣布她是“说谎者”,莫须有的罪名使她感到难言的悲痛,海伦和谭波尔安慰了她,在谭波尔的房间展示了一个温馨的场景:明亮的炉火,茶的香气,烤面包,自由的交谈。可以说,“简在劳渥德最快乐的时光是与谭波尔和海伦在一起,这可以使她们从劳渥德的残酷现实中脱离”^{[4]111}。

最初在桑菲尔德,简曾渴望“更多地结识各种性格的人”^{[3]100},生活“平静、单调、寂寞”^{[3]171},罗切斯特的到来使简的日常生活发生一次改变,她对罗切斯特说:“你在哪儿,哪儿就是我的家——我惟一的家”^{[3]232}。而社交派对上简只能坐在窗口的座位,尽管客人们发现了“躲在窗帘后面”的简,但他们无视她的存在,相继用低劣的言语议论家庭教师的问题。

在从桑菲尔德逃离并流浪3天后,简来到偏僻的沼屋,在这里她“不再觉得自己是个无家可归、到处流浪、被这个广大世界遗弃的人了”^{[3]322}。和黛安娜姐妹的交往使她感到温暖,她们产生了“一种最强烈的感情”,后来发现这家姐妹是她的表亲,她感到“像女王一样心满意足”^{[3]374}。

芬丁庄园是一个深深地隐藏在森林里的古老建筑物,其“窄窄的门窗”拒绝与外界的所有联系^[5],这里成为罗切斯特与简获得幸福的地方,她说:“在他面前,我才是真正地生活,在我面前,他也是这样”^{[3]419}。在婚姻生活中,她认为自己“幸福到言语都无法形容”^{[3]433}。

彼得·J·贝利斯认为简从童年坐在盖茨海德府的窗台上开始,就设定了一个模式:逐渐从男性的注视中脱离,最终在芬丁庄园,罗切斯特的眼睛使简获得女性主体意识。^[6]简蜷缩在窗台上角落里的形象在此被赋予女性逃离男性“注视”的意义,在巴什拉看来“角落首先是一个避难所”^{[7]147}。可以说,“角落”成为文本一贯的线索,是简的“避难所”,给予她幸福的是谭波尔的房间、偏僻的沼屋、与世隔绝的芬丁庄园,谭波尔的房间使她暂时逃离布洛克赫斯特的男性权威,沼屋给予她“归属感和安全感”,芬丁是她最终获得幸福之处,这些边缘空间是巴什拉“梦想的家宅”的现实化,它“汇集了一切他认为惬意的、舒适的、健康的、稳固的、乃至令他向往的东西”。^{[7]64}

二、话语空间的中心化

福柯把话语界定为通过其权力得以持续存在的语言再表现的诸系统,也可理解为支持权力结构的公认的思维方式。强调“把话语作为系统地形成这些话语所言及的对象的实践来研究”。“话语所做的,不止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减缩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8]对话语主体而言,“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说什么事”^[9]。“有一种话语可以对所有人开放,但有一种话语只能对部分说话主体开放。”^[10]简作为被禁止进入公共话语领域的女性主体,由说话建构了中心化的话语空间:

第一个层面是以说话寻找话语空间。简坐在盖茨海德的窗台上读《英国禽鸟史》,她“自得其乐”,直到被约翰·里德的声音打破“嘿!烦闷小姐!”遭遇里德夫人的不公正对待后,简认为“我必须说”,大吼道“你才会骗人呢!”^{[3]30}“我必须说”贯穿始终,在桑菲尔德发现疯妻伯莎后,罗切斯特要给予她没有婚姻的爱情,她说:“我得一辈子离开你”^{[3]290}。在沼屋,圣约翰要求她作为妻子共同去西印度传教,面对没有爱情的婚姻,简提出“我不能嫁给你,成为你的一部分”^{[3]390}。

由于“我必须说”,文本成为“简·爱怎样获得和使用话语权?”^[11]的过程,话语“成为简·爱开始理解和主宰世界的工具”^[12]。有论者指出,简对“说”的渴望在于“她话语看似被忽视或被强迫压制住时”^[13]。如果说里德一家忽视了简的话语,那么圣约翰没有爱的婚姻是罗切斯特没有婚姻的爱的重复,二者都试图以其话语压制简,简从他们建立的话语模式中脱离,以“我必须说”寻找话语空间。

第二个层面是以说话建构话语空间。在简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出现与他人自由交谈的场景:在盖茨海德遇到第一个同情的听众劳埃德,她知道这是“第一个也是惟一的”^{[3]19}讲述遭遇的机会。在劳渥德学校,面对布洛克赫斯特的当众指责,谭波尔给予她一个理智地讲述自己故事的机会并认可了她,“简,在我看来,你现在已经是无罪的了”^{[3]64}。之后在罗切斯特身上实现了“结识更多不同性格的人”这一愿望,他的口音“就像我自己的舌头说出来的话”^{[3]190}。在沼屋与黛安娜姐妹的交往给了她新的乐趣,“趣味、感情、原则完全一致”^{[3]334}。芬丁庄园简与罗切斯特重新结合,交谈成为一种相处方式,“我们是整天谈着话,互相交谈只不过是一种比较

活跃的、一种可以听见的思考罢了”^{[3]433}。

对于交流关系,简自白道“在跟坚强、谨慎、高尚的心灵交流时”,“我要是……不在他们的心底赢得一个位置,我是绝不会罢休的”^{[3]385}。意义在重复中显现,与他人不断地交流是简讲故事的方式,也是其存在方式,最终以“我们整天谈着话”建构了话语空间。因此有评论认为文本叙事是对话模式,叙事进程是简“与其他声音的交流对话”^[14]。开拉·卡普兰则认为,在简自童年的“我必须说”的话语模式建立后,始终在寻找一个理想的听众,因而她的故事成为理想的乌托邦式交流——“女孩谈话”故事。^[15]

三、日常生活空间与话语空间的逆向延伸

对于《简·爱》的空间问题,斯皮瓦克从简最初坐在窗台上阅读产生“自我边缘化的孤独”空间解读出简的“反家庭角色”,吉尔伯特认为简的故事是“监禁和逃跑”故事,另有论者认为简故事的每一个阶段都重复了“在异常的隔绝中寻找庇护所和独立的空间。”^{[4]110}夏洛蒂使她的角色“游走于文明与荒野之间,”最终像圣徒一样“退回到荒野”^[16]。以上评论都注意到了简日常生活空间的狭窄,如果从话语空间的角度解读,可以看到日常生活空间与话语空间逆向延伸的空间图景,不仅要读解出夏洛蒂怎样绘制其空间,还包括这一空间特征的意义。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提到,“历史……只能以文本的形式接近我们,我们对历史和现实本身的接触必然要通过它的事先文本化,即它在政治无意识中的叙事化”^[17]。从夏洛蒂所在的话语场来说,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是“被崇拜、被保护和被压迫”^[18]的对象,“女性可能是怎样?”或“她们应该是怎样?”成为一个文化现象。^{[19]98}宗教上,“圣母玛利亚是维多利亚女性的偶像”^[20]。科学上,科学家说女性的细胞有一种特殊的遗传基因,使得女子天生被动。思想文化上,考文垂·帕特莫尔认为女性应是《家里的天使》,阿尔弗雷德·坦尼松在其诗篇《洛克斯利·霍尔》中歌颂的所谓女英雄,是因为她绝对服从其粗俗野蛮的丈夫,约翰·拉斯金宣称男子是做事者、创造者、发明者,而女人则是好看的,供人欣赏的。不仅男性塑造女性,女性也塑造女性,如萨拉·斯蒂克尼·艾利斯的一系列指导女性价值观的书籍。^①她坚信女性的价值就是使父亲、丈夫、兄弟等周围的男性幸福。所以说,“这一时代是男性成就的时代——浪漫英雄主义、热衷冒险、军事征服、文学上的名望”^{[19]103}。对于女性,这些无异于“白日梦”,骚塞

告诫夏洛蒂“文学不能也不应成为妇女的终生职业”^[21]。尽管女权运动呼声日涨,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早在1792年就出版了论述女性权利的著作《女权辩护》,后有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文章《妇女的屈从地位》,但正如陶丽·莫依所指出的,前者“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当时有了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假如仍旧属于资产阶级——父系家长制的)解放思想”,后者“也正是父系家长制自由人文主义的产物”^[22]。这使得女性不仅被囿于家庭这个狭小的日常生活空间,且在男性主宰的话语实践中,成为能指符号。《简·爱》对这一状况进行了文学再现,谭波尔小姐、黛安娜姐妹都是简尊敬和崇拜的女性,高尚、谦恭、文雅,她们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理想女性形象:家里的天使。布兰奇与伯莎希望通过婚姻维持社会地位,在迎合男性话语的同时,成为了“失语”形象。格蕾丝·普尔是“其他女性的看守人”,是男性话语的代理,夏洛蒂以简的空间图景表达了一个寓言:只有在“梦想的家宅”,才能重构女性话语空间。

此外,文本的空间特征展示了文本意义的动态开放性和丰富复杂性,简有两段著名的女性宣言:“女人也和男人有一样的感觉,她们像她们的兄弟一样,需要运用她们的才能,需要有一个努力的场地”^{[3]101}。她认为与罗切斯特“站在上帝脚跟前,是平等的,——因为我们是平等的”^{[3]239}。在宣言之后却是二人在与世隔绝的芬丁庄园的家庭生活,这是典型的大团圆式结局,就读者来说,总是希望结局能提供文本所提出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简·爱》结局的阐释造成了女性主义研究的分野。由于日常生活空间的边缘化,从伍尔夫开始,研究者看到简“停滞”的反抗,认为简与社会疏离而达到她的人生目的,隐居到芬丁庄园的寓意在于只有逃离到偏远的森林深处才能得到幸福。自由在此被表达为一种新的奴役(servitude),罗切斯特的眼瞎使简从男性的注视中退出,不再作为被看的客体,这使得简的女性主义价值受到损害,使她成为一个不协调的主体。^②而话语空间的中心化使部分评论者认为结尾展示了简与罗切斯特权力争斗的结果,由于后者失去视力,二者由此建立了新的权力结构,简可以向罗切斯特描述外界的一切,成为他的“眼睛”,由于男性代表罗切斯特的依赖,简因此获得了权力。她挑战了道德规范,也挑战了对女性空间的抑制。^③一方面日常生活空间的边缘化使文本的女性主义价值受到非议,另一方面话语空间的中心化又使女主人公不再受制于男性话语的控制,二者的逆向延伸提供了文本解读的多种可能,这也正是文本的魅力所在。

夏洛蒂在1848年给威·史·威廉斯的信中谈到：“除非我有自己的话要说，并且以我自己的方式来说，我无权发表什么，除非我能够使我的眼光跨越最伟大的文学大师，去研究自然本身，我无权描绘什么，除非我有勇气使用真理的语言，摒弃世俗的陈词滥调，我理应保持缄默。”^[23]面对“她在哪里回答她是什么？”的问题，《简·爱》是夏洛蒂在社会文化机制内部对女性空间思考的文学表达，科拉·卡普兰提到夏洛蒂的文学观念是“艺术能够通过无休止的自我叙事产生，能够通过文化内部从属和叛逆的立场出发的混合而不连贯的主体性产生”^[24]。夏洛蒂以非个人化的写作进入了公共话语领域，这对文学妇女而言是一种“逾越”和“侵权”行为。“只有通过写作，通过出自妇女并且面向妇女的写作，通过接受一直由男性崇拜统治的言论的挑战，妇女才能确立自己的地位。”^[25]正如伍尔夫认为女性写作需要“一间自己的房间”，夏洛蒂在“梦想的家宅”建构了女性话语空间，成为她“自己的话”和“自己的方式”。如英国当代作家塞尔曼·拉什迪所言：“在任何社会的每一个地方，在我们内心的隐秘状态之中，我们都能听到以每种可能的方式谈论任何事情的声音。”^[26]

注释：

- ① 如 Mothers of England; Their Influence and Responsibility; Women of England; Daughters of England; Their Position in Society, Character and Responsibilities; The Wives of England; Hints to Make Home Happy。
- ② 如 Adrienne Rich's Jane Eyre: The Temptations of a Motherless Woman (1973); Helene Moglen's Charlotte Bronte: The Self Conceived (1976); Elaine Showalter's A Literature of their Own: British Women Novelists from Bronte's to Lessing (1977); Sandra Gilbert and Susan Gubar's The Mad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1979); Peter J. Bellis's In The Window-Seat: Vision and Power in Jane Eyre (1987); Bette London's The Pleasures of Submission: Jane Ey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the Text (1991); Sharon Locy's Travel and Space in Charlotte Bronte's Jane Eyre (2002)。
- ③ 如 Rosemarie Bodenheimer's Jane Eyre in Search of Her Story (1980); Janet H. Freeman's Speech and Silence in Jane Eyre (1984); Cora (1988); Melissa Lows's Charlotte Bronte: A Modern Woman (2000)。

参考文献：

- [1] Elizabeth Kowaleski Wallace. Encyclopedia of female literary theory [M]. New York/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1997: 379.
- [2] Tim Dolin. Fictional territory and a woman's place: regional and

- sexual difference in shirley [J]. ELH, 1995(1): 197.
- [3] 夏洛蒂·勃朗特. 简·爱 [M]. 祝庆英, 译. 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6.
- [4] Sharon Locy. Travel and space in Charlotte Bronte's Jane Eyre [J]. Pacific Coast Philology, 2002(37).
- [5] Parama Roy. Unaccommodated woman and the poetics of property in Jane Eyre [J]. SEL, 1989(29): 725.
- [6] Peter J. Bellis. In the window-seat: vision and power in Jane Eyre [J]. ELH, 1987(3): 640.
- [7] 加斯东·巴什拉. 空间的诗学 [M]. 张逸婧,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 [8] 米歇尔·福柯. 知识考古学 [M]. 谢强, 马月, 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53.
- [9] 高宣扬. 福柯的生存美学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5: 130.
- [10] 汪民安. 福柯的界线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154.
- [11] Rosemarie Bodenheimer. Jane Eyre in search of her story [J]. Papers on Language & Literature, 1980(4): 387.
- [12] Janet H. Freeman. Speech and silence in Jane Eyre [J]. 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84(4): 683.
- [13] Ivan Kreilkamp. Voice and the victorian storyteller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24.
- [14] Joan D. Peters. Find a voice: towards a woman's discourse of dialogue in the narration of Jane Eyre [J]. Studies in the Novel, 1991(2): 220.
- [15] Carla Kaplan. Girl talk: "Jane Eyre" and the romance of women's narration [J]. NOVEL: A Forum on Fiction, 1996(1): 22.
- [16] Suzanne Keen. Victorian renovations of the novel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80.
- [17]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 政治无意识 [M]. 王逢振, 陈永国,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26.
- [18] Maureen Moran. Victoria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M]. London/New York: Continuum, 2006: 35.
- [19] Heather Glen. Charlotte Bronte: The imagination in history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0] Jeannette King. The victorian women question in contemporary feminist fiction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10.
- [21] 盖斯凯尔夫人. 夏洛蒂·勃朗特传 [M]. 张淑荣, 李洪顺, 袁升文, 等译.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00: 121.
- [22] 柏棣. 西方女性主义文学理论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100.
- [23] 杨静远. 勃朗特姐妹研究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3: 58.
- [24] 弗朗西斯·马尔赫恩. 当代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M]. 陈永国, 刘象愚, 马海良, 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101.
- [25] 张京媛. 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195.
- [26] 安德鲁·尼特, 尼古拉·罗伊尔. 关键词: 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 [M]. 汪正龙, 李永新, 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73.